

某一天」，如果那一天能夠在世界各地實現人人幸福的公平目標的話。^{②⑥} 但是，他們卻沒有為此提出任何可行的建議，並表示出堅定的信心，反而顯得內心存在保留、疑慮和矛盾——這意味著什麼呢？

本文意在「撥雲」，相信讀者心知肚明，能夠「見月」在哪裡。

阿馬蒂亞·森的提示是，徹底解決公平和自由問題，需要解決「最初的資源分配是恰當」還是「不恰當」的**大本大源**問題，以及相關聯的收入分配問題。^{②⑦} 他已經再次觸及了以私有制為主體的自由的市場經濟不能真正實現公平和自由的核心問題，以及並不能真正全面地實現「機會平等」的問題。這和中國共產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和「國家調控市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理論上是有一種天然的內在聯繫的。

附錄 1

評論「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②⑧}

中國經濟學界的另外一種「主流」聲音是，在政府與市場關係上對「自由放任主義」的推崇。當前的兩種主要表現是，第一，認為政府的宏觀調控不如讓市場調節，市場越自由越好；第二，在收入分配問題上反對政府對初次分配的干

②⑥ 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得豪斯：《經濟學》（第17版），第607頁。

②⑦ 阿馬蒂亞·森：《理性與自由》，第468頁。

②⑧ 原文是2004年11月12日在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中國稅務雜誌綜合研究組的《香港傳真》No. 2004-33上發表的〈公有經濟和非公有經濟三題——所有制結構、公立醫院改制和勞工權益〉的一部分。

預，^{②⑨} 主張政府停止干預勞動力要素價格的形成，消除所有限制勞動力市場的政策和制度，^{③⑩} 有人乾脆直接抄襲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反對建立最低工資制度，說這是「偽善」和「造作」。^{③①}

(1) 西方政府干預市場「古已有之」。

「自由放任主義」在西方經濟史和新古典經濟學的保守主義權威文獻中得不到正面的回應，只會受到批評。諾貝爾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從古典經濟學的原始文獻中都發現了批評其不合理的根據：

甚至亞當·斯密本人，雖然堅定地注重在市場可以有效運作的情況下使用市場（而且反對一般地否定交易和市場），也毫不猶豫地研究在什麼經濟情況下可以合理地施加對市場的特定限制，或者在哪些經濟領域內迫切需要安排非市場機構來補充市場的運作。^{③②}

另外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曾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根據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也對虛偽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提出了尖刻的批評，提醒中國人注意：

「向別人學習包含著比聽取他們所說的更加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要求仔細地觀察他們在怎麼做」。如果他們進行正確的宏觀調控、實行產業政策，但不鼓勵你這麼做，就要小心了。^{③③}

②⑨ 引自2004年上半年和年中的若干媒體和內部資料。

③⑩ 2004年10月19日《光明日報》：〈如何使勞動力要素價格不再被扭曲〉。

③① 2004年11月18日《21世紀經濟報導》：「最低工資法不可取」。

③② 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第121頁。

③③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滿》中文版序言。

國外這一類善良而務實的學者還不少。

就是高度讚揚薩克斯無情地「休克」了前蘇聯的薩繆爾森，也曾經就「理性預期」學派以「理性人」為由反對美國政府干預經濟（主要指宏觀調控），試圖危及他所喜愛的混合經濟，做出了精緻的批評。^{③④} 但是，中國的體制內有經濟學人還在採用這種理論主張經濟自由，反對宏觀調控。

世紀之交，針對全球化所帶來的顯著的負面影響，聯合國秘書長在關於實行《全球協議》以維護大量弱勢人群和環境的呼籲中也提出，「讓我們聯合起市場力量和環球理念的威力，連接起私營企業的創造力和弱勢人群的需求，以及我們人類未來的要求吧。」由此可見，安南先生也不是一個迷信市場的人，他認為市場力量需要其他力量來制約和平衡，其中包括聯合國機制、企業社會責任機制等在全球發揮作用。他的這種呼籲不僅得到聯合國的認可，而且得到了數百家跨國公司的響應。^{③⑤}

再從經驗的角度看，在主要的資本經濟體中政府「看得見的手」也隨時在發揮著作用：美國政府和歐盟的宏觀經濟政策，對內干預勞動力等要素市場、干預產業重組，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對外干預全世界的市場。紡織品自由貿易協定生效剛剛四個月，美國、歐盟就對中國的紡織品出口強行打壓。日本政府製造中日領土爭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補充」本國的市場經濟，奪取資源。在東歐的國有資本被外商收購時，外國政府進行「壓價」干預，其成交價之低使有良知的經濟學家心痛不已。經濟區域化的組織者首先是各國政府。這都是經濟生活中的事實，不是嗎？另外，跨國公司在全球進行

③④ 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得豪斯：《經濟學》（第17版）第33章。

③⑤ 2003年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僱主工作部：《首屆中國僱主論壇資料彙編》、《跨國公司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展望》。

「計劃經濟」並積極影響各國政府和擁有獨立產權的諸多承包商，成為全球市場中再一隻「看得見的手」在「補充」市場，這也是常識。

(2) 勞動力市場是典型市場國家干預的重要領域。

對勞動力市場採取放任政策，剛剛出版的美國《當代勞動經濟學（第6版）》也持否定態度，並坦然宣稱，首先，在美國存在「政府通過法律和法規對勞動力市場的**直接干預**」。³⁶ 政府不斷完善有關法律法規，嚴格勞動執法，私營部門工人年均加班時間非常少，加班費和最低工資制度等都能夠落實，工傷事故不斷下降；1983~2000年，工會成員比非工會成員的工資優勢是15%，並且享有範圍更廣、總體水平更高的各種附加福利。

在美國，由於工人流血犧牲的激烈抗爭，《1938年公平勞動標準法》才規定了最低工資，到1997年最低工資標準已經上昇了19.6倍。而國會還準備提高其標準。這個制度的主要受益者是在私營部門工作的青少年、婦女和黑人。美國大約有78%的最低工資僱員是在私營企業工作。里根總統信奉新自由主義，但是他對本國新自由主義分子取消最低工資的政策性建議置若罔聞。國會也在不斷地擴大最低工資的覆蓋面。如今，美國經濟學家指出，國內對最低工資的主要爭論，早已經從是否應該存在最低工資轉移到應制定多高的最低工資。

在「休克療法」之後的典型轉軌國家俄羅斯，普京執政後，至今最低工資標準已經提高7.5倍。

我國的情況如何呢？調查和有關文獻反映，在私營部門中工人的合法權益受到僱主的侵犯現象相當普遍，其中突出的問題包括勞工的工資低於最低工資標準，經常長時間加

³⁶ 坎貝爾·R·麥克南等：《當代勞動經濟學（第6版）》，第339頁。黑體字為引者所加。

班，還拿不到加班費，等等。地方基層政府和工會失靈的例子俯拾皆是。在一些政府工程中，大量的農民工也拿不到工資。在2003年出版的《中國私營經濟年鑒》中，全國性的調查表明，在私營部門中已建工會和未建工會的企業的工人待遇差別並不明顯。2004年10月6日，深圳一家中港合資公司的三千職工因不滿薪水低（底薪230元，每天工作12小時，小時工資2.1元），「多次」向「廠方和有關部門」反映不「解決」問題，政府和工會通通失靈，導致工人停工上街四小時，政府動用近千警力、保安和防暴隊員維持秩序，並指責廠方和工人違法，唯獨對政府和工會失靈保持緘默。³⁷ 網民對此反應迅速而強烈。事後，政府對廠方實行了近二百萬元的鉅額罰款。這種事件的發生於勞、資和政府三方都不利。這幾年來，關於勞資關係失衡的信息越來越尖銳。就是在一部分國有企、事業單位和集體企業中，問題也日益突出。中央政府一再強調要加強干預。政府直接為農民工大討薪是一例。高法積極準備進一步介入勞資爭議處理又是一例。在2005年2月國務院發佈的關於「非公經濟36條」中，與《勞動法》和《工會法》有關的佔七條之多。在這種情況下面，為什麼還要求政府不干預初次分配，並「停止」干預勞動力市場？新自由主義中哈耶克的極端理論和英國「鐵娘子」主張完全由市場機制調節勞動市場，取消最低工資、實行壓制工會和降低工資的反勞工政策，在其他學派和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首腦中實屬罕見。³⁸ 其結果並沒有提高英國的競爭力，反而成為保守黨下臺的一個重要原因。英國工黨執政後在這方面堅決地進行了撥亂反正，彌補和完善了協調勞資關係的法律法規。

³⁷ 《南方都市報》，2004年10月7日。

³⁸ 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第175~176頁。〈英國如何提高就業率〉，《北京人才市場報》，2004年9月15日。

國內外的經驗表明，通過政府直接干預勞動力市場，建立有效的三方機制，在企業層面處理好勞、資雙方的收入分配和其他勞動條件問題，是一個非常大的社會問題，關係到能否在微觀層面的初次分配中奠定社會公平的基本制度保障。美國經歷過激烈的勞資衝突，在他們的《國家勞資關係法》中對於這種邏輯化的關係有著清晰的描述。而在微觀經濟學的壟斷理論和收入分配理論中，勞動市場是壟斷競爭型市場，需要政府和工會擁有反對僱主壟斷行為的手段，維護弱勢的勞工群體。

其次，美國政府還通過大量僱用人員來「參與」勞動力市場，解決就業問題。2000年，在美國政府工作的人員超過了在製造業工作的人數。政府僱員佔總就業量的約14%。其中，在聯邦部門的工作人員中，醫療衛生人員佔10%，警察佔4%；在州和地方政府中，醫療衛生和教育人員分別佔9%和52%，行政部門和警察分別佔6%。在50年中，政府部門就業的絕對量是增長的。³⁹ 由於聯邦政府部門僱員工資水平高於私營部門13~20%，實際上對私營部門的工資水平起到了一種競爭作用。

所以，政府對初次分配進行干預，包括對勞動力市場進行干預（和「參與」）是市場經濟中的正常現象。否則，這個領域中的「市場失靈」會導致嚴重的社會衝突。所以，雖然美國有新自由主義者反對最低工資制度，美國政府根本就不理睬。道理很簡單，誰也不願意自家的內院再度出現如火如荼的勞、資大戰。2004年10月6日深圳一家私人企業發生的罷工事件，也從特定角度說明了這個道理。1993~2002年，全國勞動爭議案件年均增長36.3%，涉及人員年均增長41.3%，非國有部門是重災區。近兩年，由於基數增大，勞動爭議案件增長

³⁹ 坎貝爾·R·麥克南等：《當代勞動經濟學（第6版）》，第12章。

率下降，但數千萬民工連工資都拿不到的嚴重事態卻大曝光，由中央政府直接干預才開始得到解決。就業形勢也很嚴峻。政府不干預（和「參與」）勞動力市場將會發生嚴重的社會問題。所以，中國要穩定、要發展，必需反對新自由主義不切實際的政策主張。同時，對在勞、資關係中長期存在的偏袒資方的「政府失靈」現象要下力氣糾正。